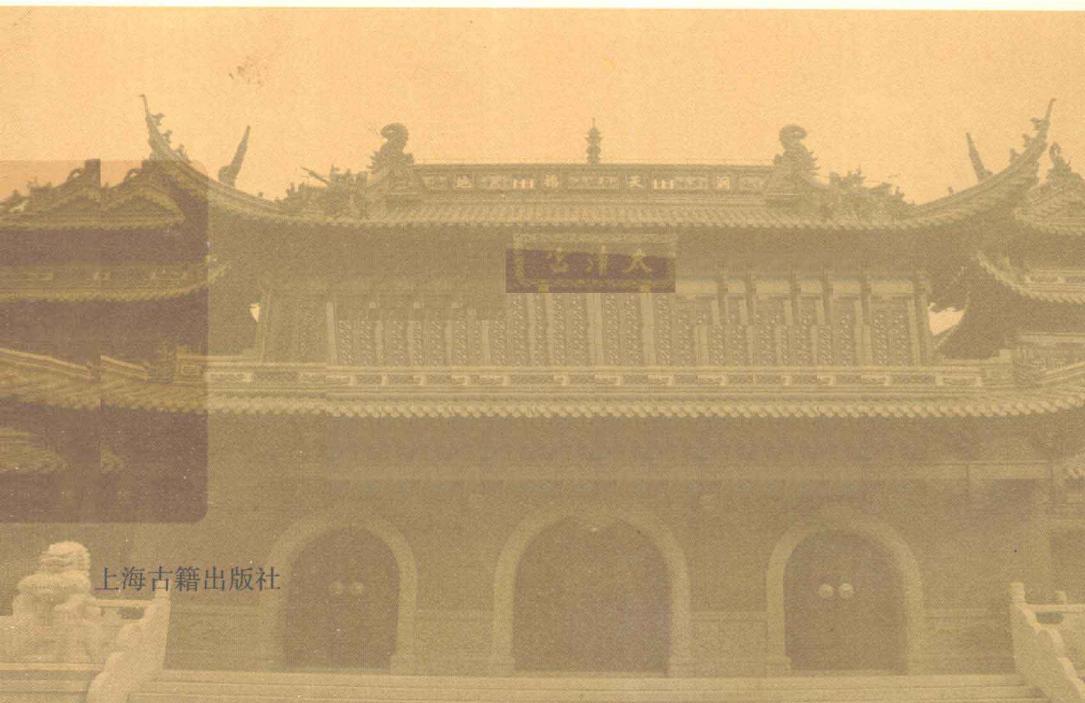


上海太清宮道教文化丛书

江南全真道教

修订版

吴亚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太清宮道教文化丛书

江南全真道教

修订版

吴亚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全真道教 / 吴亚魁著. —修订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0
(上海太清宫道教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607 - 5

I . ①江… II . ①吴… III . ①全真道—道教史—研究
—中国 IV . ①B95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7908 号

上海太清宫道教文化丛书

江南全真道教

(修订版)

吴亚魁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15,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325 - 6607 - 5

B · 789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 |
|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 6 |
| 一、学者心目中的“江南” | 6 |
| 二、本书的“江南”概念 | 14 |
| 三、全真与全真道教 | 18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举概 | 28 |
| 第四节 资料与方法 | 33 |
| 一、资料的检视 | 33 |
| 二、方法的探寻 | 34 |
| 第二章 全真道教在江南的初传 | 39 |
| 第一节 全真南传之初的江南道教格局 | 39 |
| 一、符箓诸道派的繁盛 | 39 |
| 二、合流中的南宗一脉 | 45 |
| 三、全真初传江南考略 | 51 |
| 第二节 重阳庵：始于元而盛于明 | 60 |
| 一、方志所见之重阳庵 | 61 |
| 二、重阳庵之诸多考释 | 64 |
| 三、始于元而明立丛林 | 67 |
| 四、历代所祀之神明 | 72 |

| | |
|----------------------------|------------|
| 第三节 长春道院：境内全真教祖 | 76 |
| 一、长春道院始末 | 77 |
| 二、南人眼中的北方全真 | 80 |
| 第四节 紫阳之观，甲于东南 | 86 |
| 一、至元间还是延祐初？ | 87 |
| 二、全真：南宗抑或北宗？ | 89 |
| 三、历明入清，几经磨废 | 95 |
| 第三章 全真道教在江南的盛衰 | 99 |
| 第一节 江南全真道教的初兴(1271—1368) | 99 |
| 第二节 沉寂中的江南全真道教(1368—1644) | 122 |
| 一、明代江南的全真道观 | 122 |
| 二、明代全真道教的“沉寂” | 144 |
| 第三节 江南全真道教的“中兴”(1644—1861) | 154 |
| 第四节 江南全真道教的重振(1862—1911) | 204 |
| 第四章 清代江南的全真道观(举要) | 248 |
| 第一节 湖州金盖山：陶黄旧席，吕祖宗坛 | 248 |
| 一、龙门一派，开自陶黄 | 248 |
| 二、金盖山人闵一得事略 | 253 |
| 三、云巢支派与金盖山支派 | 258 |
| 第二节 杭州金鼓洞：金鼓开堂，宗风聿振 | 266 |
| 一、创于周而扩于蔡 | 266 |
| 二、奉全真派，规矩綦严 | 271 |
| 三、金鼓开堂，宗风聿振 | 273 |
| 第三节 余杭洞霄宫：汉唐故物，群真之庭 | 277 |
| 一、汉唐故物，群真之庭 | 277 |
| 二、贝本恒其人及其师、徒 | 282 |
| 第四节 海上白云观：十方丛林，神霄福地 | 289 |
| 一、雷祖殿：此殿非彼殿 | 289 |

| | |
|-------------------------------|------------|
| 二、徐至成与海上白云观 | 292 |
| 三、海上白云观之规制 | 295 |
| 第五章 江南全真道教的流布与特征 | 299 |
| 第一节 王常月与江南全真“中兴” | 299 |
| 一、凡三登坛，而得弟子千余 | 300 |
| 二、出驻江、浙，阐太上宗风 | 303 |
| 第二节 江南全真道教的空间分布 | 306 |
| 一、苏州府 | 308 |
| 二、松江府 | 314 |
| 三、常州府 | 318 |
| 四、太仓州 | 319 |
| 五、杭州府 | 321 |
| 六、嘉兴府 | 323 |
| 七、湖州府 | 326 |
| 第三节 江南全真道教的地域特征 | 329 |
| 一、教派融合 | 329 |
| 二、回归世俗 | 332 |
| 三、成分构成 | 336 |
| 四、皈道缘由 | 341 |
| 第六章 结语 | 350 |
| 参考书目 | 354 |
| 一、文献资料 | 354 |
| 二、研究资料 | 370 |
| 后记 | 378 |
| 修订版后记 | 381 |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公元 1167 年，也就是金世宗（1161—1189 年在位）大定七年，王重阳（1113—1169）在经历了“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的人生挫顿，又经历了“甘河遇仙”、自掘“活死人墓”的神秘体验之后，东出潼关，前往山东半岛。正是在这里，他成就了创教、度人、立“观”的伟业，登上了全真教祖的宝座。不过，没有资料显示，“教祖”之位（或“谓”）是王重阳本人自封的。

据考，最早随其学道者，是宁海富户马钰（1123—1183）。王重阳于马家后院结庵而居，匾其居曰“全真”，是为全真立教之始。

马钰之后，谭处端（1123—1185）、邱处机（1148—1227）、王处一（1142—1217）、郝大通（1140—1212）、刘处玄（1147—1203）、孙不二（1119—1182）等六人相继出家入道，是为全真七子，或曰七真。

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以“异迹惊人，骑行感人”，先后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全真会社。此为全真立“观”之始，或者说雏形。

1169 年，王重阳歿。此后，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等相继出任掌教，“当时未甚知贵”。至邱处机执掌教权时，全真道教挟元太祖（1206—1227 年在位）嘉惠之势，以“立观度人”为“修行之先务”，兴

宫筑观，授徒度人，由是而“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①《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有言称：“夫全真之教兴，由正隆（1156—1161）以来，仅百余载。以九流家久且远视之，宜若滥觞而未浸也。今东尽海，南薄江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②北方“全真之教兴”，于此可以概见。

关于北方“全真之教兴”等诸多问题，相对而言，研究成果尚属丰赡，著者如蜂屋邦夫《金代道教の研究——王重陽と馬丹陽》和《金元時代の道教——七真研究》、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等。但长江以南的全真道教，则一向乏人问津，乃至一般的江南全真道教历史，大多从清初全真龙门中兴开始。鉴此，本书尝试以“江南全真道教”为研究主题。

当我们开始研究“江南全真道教”时，首先关注的一个问题必然是：兴起于中国北方的全真道教在江南这片沃土落叶生根究竟起始于何时？^③陈铭珪（1823—1881）《长春道教源流》卷七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始平宋。其先，全真教何巨川随郝经使宋，不能至杭也。”^④其意是说，全真道教的南传当始于“平宋”之后。至此，全真道教在北方已有 100 多年的传播历史；但就江南地区来说，则属于一种外来而全新的信仰形态。现有的研究虽亦显示：元代江南，确有全真道教的传播之迹，但其发生和发展的周详景况，我们知之不多。

元一统之后，所谓全真道教，一般多谓是道教金丹派南北二宗逐渐合流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这一过程究竟表现为南宗的主动归

^① 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卷，页 31—51, 181—216。

^②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页 476。

^③ 现有的研究显示：元代，江南六府一州境内已有全真道教活动的踪迹，道士有书画名家黄公望，道观则有松江长春道院等。

^④ 陈铭珪撰：《长春道教源流》（台北：广文书局，1975 年），下册，页 485。

附、北宗的积极容纳,还是其他更趋复杂、多样的情形? 关于此,借用柳存仁的话说,我们“当说茫然”。^①

一般认为,明代是全真道教发展的消沉时期,那么,江南地区的发展状况又是怎样? 我们更是“当说茫然”。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大都倾向于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道教已无可挽回地步入了衰落之途。不过,《道教通览》(*Daoism Handbook*)中德宝仁(Pierre-Henry de Bruyn)所撰《明代道教》(*Daoism in the Ming*)一章,却提出了卓然不同于众的新解。他还认为,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的歧异,其实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欠缺。因为大量的道教史研究,在述及元代道教之后,或者疾速地跨越而过,或者仍然停留于14世纪而裹足不前。也就是说,对于明代道教的发展状况估计不足,并不是事实确乎如此,而是由于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道教历史缺乏研究。^② 朱迪思·伯林(Judith Berling)对明代全真道的发展态势也作出了有别于以往中国学者的新判断,如“全真道在明代继续流传”、“全真道的修炼理论和实践传布于明代社会”等,并认为“净明道和全真道对明代知识精英发生影响的最具体可靠的证据,可能就是林兆恩的事例”。^③ 显然,她之出言立论主要还是着眼于思想文化的层面;就作为道教主体的道观、道士及其活动来说,可资为据的材料并不多见。不管怎样,所谓“沉寂”、“式微”或“处于沉抑状态”的明代全真道教的活动样态究竟如何,是考察“江南全真道教”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 关于全真道南北二宗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已有所突破,如陈兵《金丹派南宗浅探》、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卷三“全真道的南传与南北二宗的合流”和横手裕《全真教与南宗北宗》等。

^② Pierre-Henry de Bruyn. “*”. In Livia Kohn, ed., *Daoism Handbook*. Leiden: E. Brill, 2000.*

^③ Judith Berling. “*Taoism in Ming Culture*”. In F. W. Mote and D. Twich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p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即使是对明代道教持“沉寂”观的学者，对于清初的“龙门中兴”亦多有积极的评价。一般认为，清初龙门中兴，是江南全真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或如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所言：清初，“全真道出现了一派中兴景象”，“全真诸派中呈中兴之象者唯有龙门派，以龙门律宗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为中兴之祖”；此外，“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一系，门庭亦盛”。上述龙门律、宗二系，即“王常月、沈常敬门下龙门宗嗣，兴盛于江浙一带”。^①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举凡论龙门中兴者，其主要资料根据，不过闵一得《金盖心灯》一种或少数几种而已，且仅限于道内文献。全真龙门的中兴，主要表现为清初全真道教在江南地区的勃兴，或为事实所在；但有清以来二三百年，江南全真道教是否呈现出一贯的和强劲的发展态势，至少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还不能够遽下结论。闵一得的《金盖心灯》成书于1821年，重刊于1870年左右。如若所述基本可信，则充其量不过是部分地反映了清朝前半期江南全真道教的发展样貌。至于清代后期的江南全真道教面目如何，仍有待于深入和多方考察。清同治（1862—1874）年间，雷祖殿（上海白云观的前身）的创建，或许是江南全真道教尚有活力的一种表征。同时应当指出，所谓全真龙门中兴，不过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与江南地区的清以前历史时期比较，与清初之际的其他地区比较，置身于符箓道教繁盛之地的江南，全真道教自始至终处于劣势。

有元以来640多年的江南全真道教，既是一部全真道教在江南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全真道教在江南的兴衰史，更是一部全真道教在江南的变异史。置身于南宗传统和符箓道教的重重裹挟之中，江南地方的全真道教一直在不断地融合、调整和嬗变，由此而形成了江南地方独有的全真道教特征。此地域特征究竟表现为何，也是本书试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下册，页845、846、847、848。

图探讨的一个问题。

本书以“江南全真道教”为题。时间上，上推全真道教南行之始，下迄 1912 年中华民国肇建，凡 640 余年，历元、明、清三代；空间上，截取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太仓州、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等江南六府一州。江南六府一州既是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腹地，也是正一符箓道教的繁衍和鼎盛之地。可以想见，考察原本是符箓道教繁盛之地的江南地区的全真道教，对于全面和深入理解江南地方的道教样态，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傅飞嵒(Verellen Carl Franciscus)《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一文在述及“道教史”的研究成果时曾言：“像这种对特定时期、教派、人物个案的研究越是丰满，当然就越有希望导致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终产生。”^①作为地方教派史的研究，本书主要处理江南六府一州地区的全真道教这一问题，旨在通过道观的兴衰、多寡，概见江南全真道教的盛衰景况，所谓“欲观一教之盛衰，必观其教堂之多寡”。^②

陈耀庭《全真教派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在考察了“海内外有关全真教派的发展和演变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全真道研究中发现的一系列问题”后指出：“对于全真道历史和演变的研究，尽管已经在宏观把握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事实上，过细地研究全真道的历史的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目前对于全真道的研究，离开我们要认识全真道演变的全貌，掌握全真道演变的规律，还距离很远。”^③本书之所以为，正是“过细地研究全真道的历史的工作”。

希望本书的撰作，能够对“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终产生”，对“认识全真道演变的全貌，掌握全真道演变的规律”，略尽绵薄之力。

^①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年)，第 6 辑，页 344。

^② 陈垣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页 102。

^③ 《全真道学术研究报告》(香港：青松出版社，2004 年)，第 1 辑，页 15。

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

一、学者心目中的“江南”

“江南”，一个有着特定的地理方位而没有明确的区域划分的地域概念。^① 因之，在从事江南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之先，研究者们每每要对“江南”这一概念作一番甄别或界定。

关于“江南”概念的甄别或界定，先后有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②和《“江南地区”之界定》，^③周振鹤《释“江南”》，^④应岳林《“江南”初析》，^⑤等加以考辨。其中，李伯重从“江南地区的地理完整性”、“江南地区的经济一体性”、“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概念的江南地区”和“‘江南’一词涵义的历史演变”等四个方面着眼，提出了关于“江南”概念的苏南、浙北“八府一州”说，并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可说是江南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⑥ 关于江南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1990 年代以来的十几年。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研究江南地方的，但关于“江南”概念的界定，却是众说

^① “江南”，顾名思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这是“江南”的最基本义，也是人们的普遍共识；至于长江以南多大范围，则见仁见智，各持其辞。中国历朝，唐宋两代曾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唐置江南道，后析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大致相当于长江以南之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贵州等广大地区。宋置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大体相当于“长江以南”之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而唐之江南东道，大略等同于北宋之两浙路、福建路或南宋之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江南西道，则大略等同于宋之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第 5 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页 32—35；第 6 册（宋·辽·金时期），页 3—4, 24—26, 42—45, 59—61。

^②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页 100—105, 107。

^③ 李伯重著：《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附录》，页 447—462。

^④ 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9 辑，页 141—147。

^⑤ 《江南论坛》，1998 年第 8 期，页 45—46。

^⑥ 唐长孺著：《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纷纭，言人人殊。这些“江南”的地域范围由广而狭，大体相当于我们现今所谓的“南方”、“东南”、“苏南、皖南及浙江（北）”、“吴越（苏南、浙江）”、“苏南、浙北及浙东”、“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七府一州”、“六府一州”、“五府一州”等不同概念。兹分别述之：

1. 南方：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所论及的实际上只限于建康和吴会区域”，但或如唐氏所言：“所谓江南的范围可以非常广大。”^①这个“范围可以非常广大”的“江南”，可以泛指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汉代扬、荆的大部分和益州的一部分地区；^②也可以指称长江以南，但不包括四川和云贵地区；^③还可以覆盖江浙行省（初为江淮行省和福建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等广袤地域。^④ 上述种种，可说是最广义的“江南”概念。

由于历史的因素，道教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习用一些比较广义的概念。入元，由道教龙虎山天师主领江南道教事，此所谓“江南”，大抵相当于长江以南之南方地区。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有言称：“然观张道贵至李德困诸人，考其功行，尚不失全真本旨，而张守清弟子，且递传于两湖江浙间，盖自是而大江以南全真道教几遍及之矣。”^⑤又，“国朝全真派遍布于江南各行省，惟粤无闻”。^⑥ 可知陈铭珪心目中的“江南”，正是长江以南之南方地区。孙克宽有《元虞集与

^① 唐长孺著：《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页 1。

^② 黄今言著：《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页 2、3。据周振鹤《释“江南”》：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则笼统地指出：唐以前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包括长江（特别是中下游江段）以南、五岭以北的辽阔地域。可知黄著所指的江南，是秦汉时期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概念。

^③ 郑学檬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 年），页 21。

^④ [日]植树正著：《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7 年），页 68。这里所谓江南，借用了元代的行政区划概念，其所覆盖的范围，与郑学檬的“泛指长江以南，但不包括四川和云贵地区”大体相当。

^⑤ 陈铭珪撰：《长春道教源流》，下册，页 478。

^⑥ 同上，页 537。

南方道教》一篇，其中有言：“南宋地处江南，吴、楚、闽、粤各地的社会风气，本多是巫鬼迷信”云云，可知作者心目中的“江南”，大略等同于长江以南，亦即这里所谓“南方”之意。^① 陈兵《元代江南道教》一文，虽未界定一个明确的“江南”概念，但在许多场合是与“北方”这一概念相对而使用的，且主要涉及了江、浙、鄂、闽、赣等地，相当于其时的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等广袤地域。^②

2. 东南：比上述范围稍窄一些的“江南”概念，涵盖了苏、浙、皖、赣、闽等多个省份。严耀中《江南佛教史》所说的“江南”，基本范围是浙、赣、闽三省以及苏南、皖南，淮南的沿江部分也可包括在内。如此界定，自是考虑到了它们自然条件相似，经济联系紧密，文化习俗接近之故。^③ 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所述“江南私人刻书”事业，覆盖了苏、浙、皖、闽四省。^④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所表现的“江南社会生活”，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地区和赣江流域，如按现在的省(市)级行政区划，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四省一市。^⑤ 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一书中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苏南、皖南和浙江地区，同时还包括赣东北和闽西北的一小部分地区。^⑥ 王勇《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一书是论文的合集，虽未提出一致性的“江南”概念，但从论文所述及的地域先后涵括“吴越”、“慈溪”、“浙东”、“杭州”、“宁波”、“上海”、“浙江”、“闽浙”等地看，该书编者的“江南”概念还是比较宽泛的。^⑦ 阮仪三《江南六镇》虽仅处理周庄、甪直、同里、南浔、乌镇、西塘六镇，但也提出了他所认同的“江南”概念，这就是：古时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而现在则指上海市、江苏

^① 孙克宽：《元虞集与南方道教》，见《大陆杂志》，第 53 卷第 6 期（1976），页 249。

^② 陈兵著：《道教之道》（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页 69—97。

^③ 严耀中著：《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页 2。

^④ 叶树声、余敏辉著：《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⑤ 钱杭、承载著：《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页 1。

^⑥ 杨楠著：《江南土墩遗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页 1。

^⑦ 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

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以及安徽省、江西省的沿江南岸的广大地带。^① 上述学者及其著述，往往采用了比较广义的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概念。

3. 苏南、皖南及浙江(北)：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明清の戯曲——江南宗族社会の表像》一书，是以皖南徽州府为考察重心，但从此《本書關連江南地圖》看，他心目中的“江南”，应是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全部。^②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并未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江南”概念，但从他所处理问题的地域分布来看，他还是有他心目中的“江南”概念的，这就是长江以南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③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一书所指的“江南”，自认是一个特殊的概念，仅指唐代的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④大致相当于苏南、皖南和浙江等地。

4. 吴越(苏南、浙江)：同样是文化江南的概念，还有一种更为狭窄一些的吴越即江南的概念界定。如刘克宗、孙仪在《江南风俗》一书中较早提出：就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地域文化形态而言，则江南文化的区域与吴语地区大略一致，即今江苏北部古运河以东、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大部分地区。^⑤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民俗学界似乎取得了主导地位。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中的“江南”，就是整个吴越地区。^⑥ 至于吴越地区的范围，姜彬《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序论》称：“吴越文化就范围来说，目前学术界大致都认为即吴越地区

^① 阮仪三著：《江南六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2。

^② [日]田仲一成著：《明清の戯曲——江南宗族社会の表像》(东京：创文社，2000年)，页xi。

^③ 吴仁安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④ 张剑光著：《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2—4。唐初置江南道，后分江南道为江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又再析江东道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俗称为“道”。可知这里所谓的特殊概念，其实是从历史地理观点出发的区域界定，作为区域经济的研究，采用这样一种行政区划的概念，当有其合理之处，抑或出于这种选择较为方便之故。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页32—37。

^⑤ 刘克宗、孙仪主编：《江南风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绪论》，页1。

^⑥ 蔡丰明著：《江南民间社戏》(上海：百家出版社，1995年)，页13、14。

的文化，它的地望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和上海的全部。”^①周振鹤《释“江南”》一文指出：“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②梁白泉《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南水乡》和费振钟《江南土风与江苏文学》也持吴越文化即等同于江南文化的观点，但关于吴越文化的地域界定则比较宽泛：除江苏、上海和浙江外，前者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西东部等地区；^③后者虽亦兼及安徽的一部分、江西的一部分，但就浙江一部分来说，仅仅涉及浙江西部一部分，这是他与其他学者的明显不同之处。^④

5. 苏南、浙北及浙东：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所指的“江南”地区，在李伯重苏南、浙北八府一州说的基础上有所增扩，包括了宁绍平原，指近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都市——上海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辐射所及的范围。从具体行政区划而言，指清末江苏省的江宁、镇江、松江、常州、苏州、太仓直隶州，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地。^⑤徐新吾《江南土布史》所述及的区域有上海、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慈溪、平湖、硖石等。^⑥此所

^① 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序论》，页3。

^② 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页144、145。

^③ 据梁白泉主编《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南水乡》：吴越，相当于今天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周边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西东部等地区。这里亦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南。不过，此所谓“江南”已明显偏离了“江南最准确的含义还是专指长江以南地区”这一普遍共识。见梁白泉主编：《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南水乡》（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0。

^④ 费振钟认为：按照历史地理的观点，江南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域差别。广义的江南，区域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狭义的江南则是长江下游沿江南岸地区，其中现在的江苏南部从南京到苏州是其主要部分（这一部分也是历史上的吴语区），兼及安徽的一部分、江西的一部分和浙江西部一部分。而据文化地理观点，“江南”往往仅指它的狭义区域。见费振钟著：《江南土风与江苏文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5。

^⑤ 包伟民著：《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页14。

^⑥ 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是从经济地理角度出发而作的地域选择，其中，南通不在江南之列，是显而易见的。据该书《前言》：“南通虽地处长江之北，但手工纺织业比较发达，而在供销方面，和江南地区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亦收入。”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前言》，页6。

谓“江南”，也已溢出了八府一州之地，囊括了浙江东部慈溪等地。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在具体行文中，较少使用“江南”一词，而是更多地使用了“长江下游大区域”或“长江下游流域”这样一些概念，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半部与浙江省北半部的大区域，“相当于相继不断变迁而先后以扬州、杭州、南京、苏州、上海为中枢首府的直接腹地”，但该书后篇涉及宁绍地区，并以为“是与这一大区域划分完全一致的一贯构想”，由此更加印证了作者“之所以采用江南一词，无非是出于这种选择的便利考虑”。^①

6. 苏南、浙北八府一州：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李伯重依据江南地区的“地理完整性”、“经济一体性”、“作为一个特定地域概念”和“‘江南’一词涵义的历史演变”等四项标准，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浙北八府一州说，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和太仓一州，^②并在学术界特别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如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明确表示：关于“江南地区”，本书基本采纳了李伯重的界定区域，主要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③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同意李伯重的意见，“将研究区域确定为有着特定生态条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④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所指的“江南”，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之地。他与金文合著的《江南丝绸史研究》一书中的“江南”概念，当与此相若。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似未曾明言，但编

^①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39、36。

^② 初为苏南、浙北八府，清雍正（1723—1735年在位）时期，太仓州从苏州府析出，遂衍为八府一州。

^③ 张海英著：《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4、15。

^④ 张佩国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